导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五十周年了。当人们回首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所走过的路程时，会惊奇地发现，尽管新中国自成立起就处于一个又一个艰难困苦的国际环境之中，但她每次都能通过适当的外交战略和策略，巧妙地利用各种国际力量制衡于国际关系舞台，以不败的姿态化险为夷，给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断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外交在坚持自己基本原则的同时，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战略和策略。调整的幅度之大，常常使研究中国外交的外国学者感到困惑：中国曾是苏联最坚定的盟友，后来又成为最不妥协的对手；中国曾与美、日不共戴天，后来又联手对付苏联；中国在自己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援助，而当中国经济好转的时候这种援助却减少了……说中国是“东方国家”吧，中国更多的时间是在与以苏联为首的前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斗争，而不是在捍卫这个阵营；说中国是“南方国家”吧，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国家、重要的武器提供国，她从未停止向“北方”发达国家看齐；说中国是“大国”吧，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没有超过西班牙，人均国民产值甚至低于几内亚和多哥……由此，外国人得出结论，研究中国外交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人们熟知的判断标准一应用于中国就不灵了”[①]。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误解在国际上还远不是绝无仅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由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外交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多么必要！

其实，如果真正懂得中国的历史并理解中国的现实，有关学者也许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或发出这样的感慨了。中国外交自有其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进步。中国外交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这就是中国人民对独立、主权、尊严、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珍视。这种珍视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对人类社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中国人为此感到自豪。然而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主权遭到侵蚀，领土支离破碎，租界、治外法权、不平等条约像毒蛇一样缠绕在中华民族身上。古代文明的辉煌与近代历史的屈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种反差的心态中，中国人对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问题极为敏感。当中国人民终于赶走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了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中国人民怎能不特别珍视这失而复得的独立、主权与尊严？中国人民对外国损害自己主权的企图怎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是中国外交独立自主性的根本原因。

当新中国领导人宣布要“另起炉灶”、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时，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经济基础如此薄弱，离开

① ［法］弗朗索瓦·若由：《帝国的欲望：1949年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法国国家出版局1994年法文版，第9～10页。

了美国的援助，中国人怎么能活下去？1950 年中国收回美国在北京的兵营、地产时，美国政府竟以“撤回所有美国在华官方人员”相要挟，没想到中国政府的答复是：“我们宁愿听到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能够更快地离开中国。”① 1958 年毛泽东断然拒绝苏联提出的“联合舰队”要求时，赫鲁晓夫百思不得其解：既然中国已经“一边倒”了，为什么还在这种“小事”上斤斤计较？赫鲁晓夫诘问毛泽东：“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针锋相对：“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华民族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侵略、掠夺愤恨情绪的自然流露。杜鲁门、赫鲁晓夫之流怎么可能理解中国人民的这种感情？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历史上，在中国最鼎盛的年代，当中国的科技及生产水平领先世界时，中国向远方输送丝绸、陶瓷，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却并没有派出远征军去征服世界；中国的祖先发明了火药，去制造了烟火庆祝歌舞升平，却没有用它来制造枪炮侵略别人；中国的祖先发明了罗盘，却并没有用它制造兵船横行四海。然而，从 1840 年开始，中国却陷入了外敌入侵的血雨腥风之中。整整一个世纪，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没有享受过一天和平安宁的生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才看到了长期和平和安定的希望。中国人

①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美国前外交人员从中国撤退事的谈话》，1950年 2 月 5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第 1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 10 月版，第 97 页。

民珍视和平，因为，即使在和平环境中，中国要用 7%的世界耕地来养活 22%的世界人口，并提高这 22% 世界人口的生活质量，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中国还不得不面临战乱，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更为困难。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世界和平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中国外交和平性的深层次原因。

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取盲目偏激的仇外行动。1944 年至 1946 年，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理解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美国政府最终采取了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政策。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1949 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仍然向滞留南京的美国大使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但美国不但没有作出积极回应，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立即表态继续支持已经失去任何法理依据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敌视背景下，新中国只能从苏联那里寻找同情、支持与友谊。这是 50 年代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重要背景。美国对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台湾海峡局势的干涉赋予了“一边倒”更加具体的战略内涵，美国在这一时期没有敢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大陆来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就是中苏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

然而，5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调整对美战略，寻求美苏之间的缓和以共同主宰世界事务，而中国对美国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威胁中国安全的行径还必须进行坚决的反击，中苏之间的战略需求发生了差异。奉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中国成了苏美“大国合作”主宰世界事务的障碍。在美国对华敌视政策没有任何松动的情况下，中苏关系又日益不可避免地破裂了，中苏从盟友变成了对手。恰在此时，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又因边界冲突而极度恶化，国民党也在东海前沿蠢

蠢欲动，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至 60 年代中期，中国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实实在在的战略威胁，不得不为应付四面八方联合反华的可能作好准备。中国领导人以几近悲壮的心态宣告：如果美帝决心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我们最后还是会胜利的 60 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明显地显现出了“两面开弓”的特征[①]。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极左思潮的交相作用，成为引发“文革”的重要原因，反过来又使中国外交在“文革”中受到了剧烈冲击。

1969 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发生后，中苏两国走到了大规模战争的边缘。苏联对中国进行所谓“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可能，使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直接、最紧迫、最严重的战略威胁。而与此同时，美国在与苏联争霸的角逐中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需要借助于中国的力量。中美双方都有了改善关系的实际需求。基辛格、尼克松先后访华，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撤出印度支那问题上作出了有限度的承诺，尽管中美之间的问题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求成为中美关系缓和的最有力的催化剂，中美于 1972 年发表了第一个《联合公报》，1973 年互设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的“联络处”,并终于在 1979 年达成了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协议。在整个 70 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点在于促成一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即有名的“一条线”战略中国与美国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求使“一条线”战略成为可

①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 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5～266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能，而“一条线”战略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关系的缓解，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改善，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好的条件。

然而，“一条线”战略使美国产生了误解，以为中国因害怕苏联而有求于美国，以为美国只要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中国就会忍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举动。80 年代初期，随着美国里根总统上台，美国反华亲台政治逆流甚嚣尘上，要恢复与台湾的官方关系，要向台湾出售大批量高性能武器，使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又立即濒临倒退的边缘。中国领导人根据美苏争夺战略态势出现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了对外政策，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不再搞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缓和了与苏联的关系，但掌握分寸，不寻求中苏关系回到 50 年代的状态。这种以“不与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为要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美国搁置了与台湾关系升格的打算，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作出了“逐步减少、最终解决”的承诺，在对华技术转让方面放宽限制。而苏联也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开始松动。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处于一个相当主动、有力的地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因此而受益不少。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然而，恰在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波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主宰战后世界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瓦解。曾经使中国与美国走到一起的共同对苏的战略需求不再存在，美国急欲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以西方价值观为准绳的、以北约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单极世界，而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进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曾经被共同对苏战略需求所掩盖的中美之间的固有矛盾开始凸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压力增大。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确立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准确地把握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创造性地执行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巧妙利用矛盾，及时抓住机会，解决了许多外交难题，迅速打破了西方的“制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营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五十年的中国外交，是中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主持国际正义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国际环境中勇敢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利益与尊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崛起而不断改善周边环境、创造有利国际条件的历史；是中国引起世界重视并赢得世界尊重的、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历史。

我们为新中国外交所创造的伟大业绩而骄傲，我们为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驾驭各种复杂局势的非凡能力而赞叹。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在解决各种复杂国际问题时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理论及方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给我们以足够的勇气迎接新世纪的任何挑战，也将给我们以充分的智慧抓住新世纪的一切机遇发展自己。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五十年中国外交所服务的事业，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开创性的事业，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事业一样，中国外交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随着国家政局的变化而经历过曲折。五十度春秋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时间和素材，使我们能以客观、冷静的心态来审视中国外交走过的这半个世纪不平凡的历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在研究历史时不虚美，不掩过，既不因为伟大成就而讳言失误，也不因为曾经有过的失误而采取否定历史的唯心主义态度。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从容地面对现实，才能自信地走向未来。我们研究五十年的中国外交，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目的。

第一章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逻辑结果——“一边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新政府国际战略最鲜明的特点，是在国际政治力量东西方两大阵营中的“一边倒”。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用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口吻向全世界阐释了“一边倒”的历史必然性：“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①] 与“一边倒”战略相辅相成的，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也就是不继承旧政府与外国建立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不急于获取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而必须在彻底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载《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 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2～1473 页

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的前提下，在相互平等的全新基础上来重建新中国的对外关系。

多年来，“一边倒”战略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有观点认为，“一边倒”这一基于意识形态的战略堵死了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可能，又鼓励了苏联在对华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因而对中国国家利益并非是最为有利的选择。50 年代末中苏关系的恶化似乎更加证实了“一边倒”的偏颇。 80 年代中国开始执行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后，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一边倒”，而是站在美苏两大阵营中间，利用矛盾，左右制衡，掌握主动，有什么不好呢？

因此，客观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政治的互动关系，历史地研究战后初期美苏对华政策以及这种对华政策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供的决策回旋余地，就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决策的关键，从而也就成为理解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关键。

第一节　战后美、苏对华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影响

一、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灵活倾向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要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对外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旧中国一百多年

来的屈辱外交，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真正独立、平等的地位。而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使中国蒙受屈辱的主要外部因素，恰恰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的侵略压迫。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帝色彩，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拒绝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拒绝立即争取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

事实上，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美国决策人对中国国内政治和历史发展趋势有一个合乎实际的认识，为将来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创造条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44 年，为欢迎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参观，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文件明确指出，接待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地也适用于国际统战”；“国内统战政策给我党以极大发展，今后国际统战如果能够获得成功，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增加许多便利。在国际统战中，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美英等西方国家排斥在国际统一战线之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待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上的两派意见，“一条路线是，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力量和这个力量的中坚：中国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而主张和这个力量合作，反对中国反动派利用美援打内战。另一条路线是，不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只承认国民党政府，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①。尽管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在中

①延安《解放日报》1945 年 6 月 25 日社论：《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问题上的倾向性已经很明显，但中国共产党仍曾寄希望于美国政策的改变：“中国人民知道这样一些必要的区别：第一个，美英政府与广大美英人民的区别，第二个，美英政府中决策的人与其他广大工作人员的区别，第三个，今天的政策与可能改变的明天的政策的区别。例如，最近半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如果有一天它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并不要反对到底。”①

对于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来中国进行的调停，中国共产党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并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马歇尔在延安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朱德在专为欢迎马歇尔访延安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说：“我们相信国共两党的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加上中美的团结与美苏英中各大国的团结，一定能够战胜一切障碍，中国一定能够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建设，中国一定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中国一定能够与美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友邦亲密团结，巩固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解放日报》发表专论称，“马歇尔将军来到延安，的确是值得全中国人民欢迎的喜讯。他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更密切的接触，将使他和美国政府、人民有可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愿望，这对于他和他的后继者今后的努力，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中国人民之所以热忱欢迎马歇尔将军，热忱和他亲密合作，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他的努力方向符合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基本利益”②。

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

① 重庆《新华日报》 1945 年 7 月 7 日社论：《纪念抗战八周年》

② 延安《解放日报》 1945 年 3 月 4 日社论：《欢迎马歇尔将军》。

次表示，中国共产党所希望建立的政权与苏联是有所不同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阐述：“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① 《解放日报》评论文章指出，“新民主主义中国所要实行的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各阶级的民主的联合专政，这当然既不是美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②。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对“自由民主的中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③。

从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最初的宣传动向中，我们找不到“一边倒”政策的痕迹。事实上，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未来的新中国所构想的，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全方位的对外友好关系。为实现这一构想，中国共产党为自己未来的对美对英政策留下了相当大的政策回旋余地。那么，这种构想为什么未能实现，这一政策回旋余地又是怎样消失的呢？

二、美国在战后中国问题上错误的战略选择及其后果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同情时，并没有不切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1062页

②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7月20日评论：《再评赫尔利政策》

③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报道：《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答路透社记者书面问》

实际的幻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指望美国能支持自己，而只是希望美国不要帮助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希望美国能在国共两党的争斗中保持中立，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如《解放日报》所表明，“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的政策，并不希望它帮助中国人民，只希望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即是说，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然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却使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地失望了。马歇尔调停国共的目的，是“试图在两派之间达成协议以避免内战，帮助国民党人在中国尽可能广大的地区建立权威”，实际上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当马歇尔拉偏架式的调停不可避免地失败后，美国便完全站在了国民党一边，帮助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了全面军事进攻。延安则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美国的失望和愤怒，《解放日报》评论指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本来可以“不是帝国主义政策，而是民主主义政策，这件事对于美国政府是轻而易举的。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特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①。

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享有的民心与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发出的愿意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的信息。特别是美国驻华的中下级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如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柏、驻上海总领事卡伯特、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谢伟思等，他们是直接从事具体外交工作的，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了解比他们的上司深入得多。

①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社论：《蒋军必败》。

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因此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必然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与苏联的关系之上，中国共产党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不可能成为苏联的驯服工具。柯乐柏等人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现实主义政策，以加大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分歧。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驻苏大使威廉·布立特却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去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和联络，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苏联兄弟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关系本身就足够对中国的国内安全造成可能的威胁”①，“苏联帝国主义步沙俄帝国主义的后尘，利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苏联强权政治的工具，正在竭力使中国处于苏联的卫星国的地位”②。这种观点对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种种区别和矛盾视而不见，把中国共产党完全看成是苏联的政策工具，主张美国政府在中国采取支持国民党、打击共产党的强硬政策。

远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决策者受冷战思维所局限，把在远东发生的各国民族民主革命全部视为苏联势力扩张的产物。非常自然地，美国政府采纳了司徒雷登等人的建议，通过“调停”帮助国民党建立一统天下的努力失败后，美国采取了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以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尽快在全中国范围内扶持起一个亲美反苏政权的政策。然而，尽管美国尽了全力来帮助国民党政权打内战，但国民党在内战中屡战屡败。到 1948 年底，不少美国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在内战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英文版），美国政府出版物， 1947 年第 7 卷，第 223 页。驻华使馆备忘录

② 弗兰茨·舒曼等：《中华民国——民族主义、战争与共产主义的兴起·1911—1949》。纽约 Vintage 图书公司 1967 年英文版，第 340 页。

中彻底失败已不可逆转。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怎样从中国这个泥潭中脱身的问题。

1948 年 9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就美国对华政策提出备忘录，首次指出国民党是无底洞，美国无法挽救其失败，美国应该从中国脱身。此后，美国政府确实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中国的卷入。辽沈战役时，司徒雷登曾急电美国政府，要求提供紧急援助；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也致信马歇尔，要求美国军官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但马歇尔表示，美国不得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也不得在军事上、经济上为蒋介石政府负起担保的责任。蒋介石又要求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支持国民党政权，杜鲁门以圆滑的外交语言答称：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立场一向都很清楚，没有必要另行发表声明。蒋介石派其夫人宋美龄专程赴美国游说，但美国仅以马歇尔国务卿的私人客人的身份接待宋美龄。这位“第一夫人”此番受到的冷遇与她在抗日战争期间访美引起的轰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政府的“脱身”政策受到了其国内反对派的猛烈抨击，过去美国政府为了替自己扶蒋反共政策找依据而制造的种种理由，现在都成了反对派攻击政府的有力武器。杜鲁门政府被指责为“出卖蒋介石”“对共产主义手软”“丢失了中国”，等等。在反对派压力下，杜鲁门不得不指示“不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并向国会提出提案，将已到期的 1948 年援华法案延期到 1950 年 2 月，使国民党仍然可以使用该法案额度下的 5400 万美元余款。国民党军队被赶出南京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想说明尽管美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国民党政权由于其固有的弱点而不可救药。“白皮书”的发表再次引起了反对派的狂热攻击，认为杜鲁门政府对

国民党是“落井下石”。作为妥协，美国政府于 1949 年 10 月再次向国会提出法案，决定向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中国一般地区”追加援助拨款 7500 万美元。结果，美国不但未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反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陷入更深。

事实表明，美国政府完全丧失了时代感，当它把自己与一个独裁的、腐败的、丧尽了民心且注定要垮台的政府捆在一起时，它就不仅站到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对立面，而且也失去了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行动自由，只能硬着头皮走到极端，从而也就把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推到了另外一端。

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但没能改变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反而招致了中国人民的极度反感。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大众参加解放战争的一个有力口号法国著名政治学家雷蒙·阿隆对这一政治现象有过一个十分有趣的评论：“美国对蒋介石支持得太多了，因为它招致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各种反蒋人士的厌恶，然而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又很不够，因为它未能保证蒋介石的成功。”① 事实上，很多工农大众参加解放战争，并非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多么深刻的理解，而是出于对美国扶持下的蒋介石独裁腐败政府的一种朴素的不满。这一点对于解放战争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取得全面胜利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反对美国侵略中国”这一口号对中国共产党 1949 年取得的胜利曾起过极大的作用，但在同时，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反美立场在人民大众中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又缩小了新中国政府在制定对美政策时的选择余地，形成了限制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灵活性的国内政治因素

① 载于 1950 年 1 月 5 日法国《费加罗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